

山西农信社改制难题：“被贷款”事件频发，坏账率居高不下

本报记者 汪晓东

晋北农村信用社这场击鼓传花式的“被贷款”接力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继山西天镇县农民“被贷款”事发之后，朔州市平鲁区又牵扯出冒名贷款事件。2015年开始，原本立足于服务农村的山西农村信用社，因为屡次发生“被贷款”事件而深陷信用危局。

“被贷款”事件暴露出当地农信社系统乱象的冰山一角。2006年之后，在经历多家主管机构的更迭之后，农村信用社持续在中国广阔的乡村发力。在扶持“三农”获得最初的喜悦后，一些不良贷款亦开始产生。

2015年，占据农村金融半壁江山的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大限将至。但问题是，要改制，还要面临如何降低坏账率、明晰产权等诸多挑战，这一过程难言顺利。

信用危局

对于落在自己名下的贷款，住在朔州市平鲁区的高平（化名）实在无法理解。他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回忆，今年7月他在向平鲁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时，被告知因2万元贷款逾期未还已被列入信贷黑名单。

让高平闹心的不止于此，其妻子名下也不知何时“被贷款”2万元。高平感到蹊跷，从来没有申请贷款，夫妻两人如何身负4万元贷款？

高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最近，山西天镇发生的莫名“被贷款”事件让众多农民心惊胆战。

平鲁农村信用社告知高平，如果申请贷款，必须清偿以前的债务。而更让高平担心的是，在查询的个人信用报告中，他的信用记录已被拉黑。这意味着，至少数年内，高平将无法申请贷款。

记者试图在朔州农村信用联社还原此次“被贷款”事件，但联社纪检委建议记者向下一级平鲁农村信用社了解情况。

“目前，已查实的‘被贷款’数额为10万元。除去发生问题的信用社原负责人任小东所贷4万元之外，能落实的问题贷款为6万元。”平鲁农村信用社监事长闫忠清告诉记者

者。至于是否还有其它“被贷款”事件，他表示尚不确定。

近年来，当地“蹊跷贷款”事件时有发生，以至于朔州白堂乡信用社把贷款给了死人的消息一度成为网络搜索热词。

闫忠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亦坦陈，1996年，农村信用社与监管单位农业银行“脱钩”后，“被贷款”等一系列问题开始发生。

“我们不比其它银行，过去的系统没有和央行联网。”闫忠清认为，冒名贷款是由于信用社系统硬件落后造成的，在审核贷款人时，只能依靠身份证明和指纹来确定。

闫忠清告诉记者，目前，高平的贷款已经归还，但要想解除信贷黑名单尚需至少一年。但一个疑问由此产生，究竟是谁偿还了贷款？

而在高平看来，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尽快解除信用记录被拉黑的情况，而闫忠清则告诉记者，这一过程需要信用社报央行才能核销。

在媒体的报道中，山西天镇最近发生的“被贷款”事件中，反映“被贷款”的人过百，“被贷款”数额从2000元至80万元不等，贷款总额逾1000万元。

改制难题

在很多金融人士眼里，农村信用社的改制是个缓慢的过程，其中要解决企业化运作水平较低，创新动能难以有效释放等诸多问题。

“体制、机制、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新业务拓展的成本等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山西晋商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郭志勇说。

2013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亦对媒体表示，农商行并不一定比农信社、农合行先进或是高级，关键是看机构治理、人员素质、敬业水平等因素。

不难看出，事实上，农信社的改制仍存在不同发声。其实，从农村信用社的性质等方面来看，它的改制注定有些投鼠忌器。

“不同于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从所有制性质来看，农村信用合作社属于集体经济性



按银监会要求，2015年是农信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收官之年，面临如何降低坏账率、明晰产权等诸多挑战，这一过程难言顺利。

质，它属于公有制经济范畴。”郭志勇说。与其它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经济性质相比，它不属于国有经济。因而它不具备一般银行所具有的“血统”，一种说法，其产权模糊也是改制所遇到的难点之一。

对于朔州农村信用社来说，改制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闫忠清看来，朔州信用联社的改制似乎遇到一些问题。“目前，平鲁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超过2亿元，坏账率达到8%—9%。”他告诉记者。事实上，坏账率至少应该低于5%才能达到改制标准。

但上述不良贷款仅仅是平鲁区农信社的数额，朔州市信用联社的具体不良贷款，记者未能从杨姓理事长口中得知，其也未对《中国企业报》提出的其它问题予以答复。

农村信用社自身经营状况令人十分堪忧，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农村信用社资产总额达15.5万亿元，负债总额14.5万亿元，分别为2002年末的7倍和6倍多。资产、负债总额占全部银行业比例分别达到11.8%和11.1%。

“相比之下，平鲁农村信用社的坏账率其实已经很低，实际上，其它地区的坏账率甚至达到10%。”闫忠清告诉记者。不良贷款低于1亿元，低到7000万—8000万元，才是改制的最佳效果。

艰难破局

2010年，银监会表示，未来五年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将全面完成。这意味着今年是改制的收官之年。

前瞻产业研究院《2015—2020年中国农村商业银行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

析报告》数据显示，自2011年起，农村商业银行每年新增数量均在120家以上。截至2014年底，全国农村商业银行已达665家。

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的网点数分别为3269个、3088个，占总网点数的比重分别为4.02%、3.79%。可以预见，随着农信社全面改造成农商行，农商行未来在涉农金融机构营业网点中的比重将上升为第一位。

一方面，在银监会全力推动之下，诸如重庆农商行的赴港成功上市，表明各地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步伐明显提速。而另一方面，一些相对落后的城镇则仍徘徊在路口。

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主要涉农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总数为81397个，其中农村信用社网点数为42201个，占比为51.85%，排名第一；农村商业银行网点总数为32776个，占比为40.27%，排名第二。

农信社网点的比重仍然占据半壁江山，改革任重道远。

“农信社的股东为全体社员，管理层由理事长、监事长和主任构成，且直接由上级任命。”郭志勇说。这样看来，社员股东及社员代表大会实际上就没有了话语权。

而闫忠清告诉记者，“真正有权力的是主任。”

有媒体报道，即便是完成了风控制度的构建，不少农信社的风控能力仍旧难言乐观。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局限于贷款审批过程控制，风险监控部隶属于业务主任。这明显违背银监会经营和监督职能分离的原则，但这样的职能设置由省农信社统一规定。

然而这些职能基本限定在事后检查，与贷前调查和贷后检查等重要环节脱钩，无法起到全面风险监控的作用。

因此，从平鲁农村信用社发生“被贷款”事件到闫忠清坦承存在管理等诸多问题，这一切看似再正常不过。

一些发达地区能够顺利改制成为诸如北京农商银行、上海农商银行等，得益于管理相对完善。2015年，农信社改制还需突破人事、管理、不良贷款率、产权等众多困扰。

旅游统计数据虚实之间：离家6小时竟成旅游人士

本报记者 钟文

生活在浙西小城开化县的阿丽怎么也没想到，她和小姐妹逛了一上午街，中午又在外吃了一顿饭，竟然为开化的旅游数据做出了贡献——出门6小时就算一个旅游人次。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仅是开化县，多个省市尽管统计口径不一，但也基本相近，多以出门几个小时、多长路途或者移动手机信号作为采集数据的依据。

相关政府人员也对记者坦承，旅游数据不一定准确。针对这一问题，刚刚结束的全国旅游统计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拟筹建全国旅游数据中心，解决旅游统计滞后难题。

旅游数据疑被夸大

开化县位于浙江西部，是浙江母亲河钱塘江的源头，与皖赣二省交界，森林覆盖率高达80.4%。近几年，旅游业搞得风生水起。今年6月，成为国家发改委选定的全国9个、浙江省唯一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地区。早在2013年，该县就启动了国家东部公园建设的规划部署。

不过就在开化县雄心勃勃的创建国家公园的同时，其旅游数据统计方式却遭到外界质疑。

“一年500多万人次，水分也太大了吧。”在开化做旅游产品的刘洪庆（化名）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你去旅游景点推算一下，不可能有这么多人。

当地媒体报道，2015年1—6月份，开化县旅游人数304.78万人次，同比增长17.91%，实现旅游收入19.12亿元，增长19.28%。

刘洪庆为记者简单算了一笔账：“按照

现在旅游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而地方政府对旅游经济又非常重视，这时数据的把握就很重要。出于宣传的考虑，如果旅游人数少了，怕被人误以景点不好、服务不好、旅游环境不好等产生负面影响。

查，数据还是比较严谨的。

黄副局长告诉记者，为创建国家公园，当地对环保不达标企业全部关停，仅去年到今年6月份就关闭了68家。他坦承，对于开化这样的一个山区县，关停这么多的企业，压力非常大。关停企业就意味着斩断了税收来源。但县委县政府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就是走生态发展之路。

黄副局长表示，尽管统计数据不一定很科学，但他们的数据还是比较保守的，是实打实的，他们周边地区的旅游人数都比他们多。他说，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文化旅游是第一产业，是支柱产业。为此，他们为旅游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上海，县委书记亲自带队走进高校、社区推销他们的旅游产品。另外，各个机关单位、乡镇都有旅游任务，像抓招商一样，寻找游客资源。

统计口径是个问题

事实上，不仅是开化县，《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各地旅游人数统计方式大同小异。同属衢州市的江山市，2014年接待国内旅游者880.35万人次，增长25.4%，全年旅游总收入50.83亿元，比上年增长25.6%；龙游县全县接待旅游总人数899.02万人次，同比增长25.2%，旅游总收入52.35亿元，同比增长25.7%。

与开化相邻，有着中国第一旅游县美誉的江西婺源县，2014年的旅游人数达127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64.7亿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婺源的门票收入就超过3亿元。

旅游人数的统计非常复杂。衢州市旅游局规划处小余告诉记者，他们每年都邀请第三方做旅游抽样调查问卷，主要做宾馆住宿和景区旅游人群问卷。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很难一下说清楚。简单一点说，

就是游客进入目的地6个小时开始计算，如果达到6个小时，就算一个旅游人次。

这点让刘洪庆很不理解：“如果按照这样的算法，开化很多领导干部、机关单位职工、企业员工家都不在开化，每天往返开化与家之间，最后不都成为旅游人次了吗？而开化本地在乡镇上班的人或者住在乡村的人每天也往返县城与乡镇之间，算起来这是多大的旅游人次呀？”

“严格意义上说这是商务活动，不能算旅游人次的。”江西上饶旅游局办公室一位方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一般是按照出门4小时，离家20公里计算，至少得离家10公里。但他坦承，实际上也是不准确的，只能做一个参考，像两城往返上班往往也算进去了。

黄山市旅游人数统计是按照《旅游统计调查制度》的口径来做的。黄山市旅游局计财处一位张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全国一般都是按照这个制度来做的，出门几个小时、多少公里都有规定的，但是对于以商务或者说赚钱为目标的一般不应该算进去。

记者看到浙江某地的两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问卷（A、B）》，问卷主要包括常住地、住宿、旅游方式、交通、开支等16个大项。其中在宾馆抽样的A卷就有出行的目的，包括观光游览、探亲访友、商务会展等10个选项；在景区抽样的B卷上第一项就是出行时间是否在6小时以上，第二条是距离住所是否在10公里以上。

倒逼统计方式改革

一位旅游专业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旅游人数的统计很难，口径不一，数据就会相差很大。像这种问卷，问卷人和答卷的人都要非常认真、严谨。但问题是，问卷人在做问卷的时候，别人不一定配合你

做，问卷人是否会作弊自己填写呢？答卷人就算作答也不一定很严谨，随意性很大。比如花了多少钱，可能就随便填一个数据；再比如旅游方式，现在反腐力度这么大，就算单位组织的他也不一定填单位组织等。

“旅游统计数据不靠谱。”一位曾专门做旅游人数统计的人士告诉记者，以前他们公司专门帮旅游局做旅游人数统计，主要是以移动电话的信号为准，只要你进入设置的这个区域，就算一次，现在很多人都有2部甚至多部手机，那你已进入这个区域就是2次或以上的人次。

专门做旅游研究的浙江大学旅游学院旅游研究所副所长周永广博士对记者坦承，他只看景点的门票数和酒店的客房数，而且只能看星级酒店数，但也不准确。

要精确的统计出每个景点的人次和旅游收入是根本不可能的。某省旅游局一位负责统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做法是把本省的几个著名景点的实际客流量和收入以及星级酒店的入住率作为蓝本，来估算本省的总数以及增长率。他说，现在旅游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而地方政府对旅游经济又非常重视，这时数据的把握就很重。出于宣传的考虑，如果旅游人数少了，怕被人误以景点不好、服务不好、旅游环境不好等产生负面的影响。

在安徽黄山市刚刚结束的全国旅游统计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会议上指出，旅游统计严重滞后是中国旅游亟待攻克的难题之一。他要求彻底结束没有旅游数据总量分析的历史。

旅游业“大产业、小统计”的发展现实，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家旅游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国家旅游局从旅游发展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出发，决定组建国家层面上的旅游统计和数据分析专业机构——国家旅游数据中心，日前，正在履行相关审批手续，不久将正式挂牌。